

交往与恩怨丛书

李勇/主编

政学之间

——梁启超的多面人生

张晓川 范矿生 著



东方出版社

交往与恩怨丛书

李勇/主编

政学之间

——梁启超的多面人生

张晓川 范矿生 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张新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学之间——梁启超的多面人生 / 张晓川，范矿生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9

（交往与恩怨）

ISBN 978-7-5060-4124-9

I. ①政… II. ①张…②范…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生平事迹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6420 号

政 学 之 间

ZHENGXUE ZHIJIAN

——梁启超的多面人生

张晓川 范矿生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0.75

字数：164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4124-9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梁启超与康有为 / 001

绕不开而不得不绕开的康、梁 / 001

康、梁早期生活与会面 / 002

科场寻卷与康、梁的科举之路 / 007

晚清风气和康、梁戊戌前的活动 / 013

康、梁的宣传攻势以及成为抹黑工具 / 021

康、梁出逃海外以及其分合 / 029



第二章 梁启超与戊戌六君子 / 035

戊戌六君子原来 / 035

晚清政局和所谓帝、后两党 / 038

梁启超与谭嗣同 / 042

戊戌年政治形势 / 049

戊戌风潮中的六君子 / 060



第三章 梁启超与袁世凯 / 069

一般历史认识之下的梁启超和袁世凯 / 069

谜一样的戊戌年和事后说法 / 071

民国时期的梁启超与袁世凯 / 085



第四章 梁启超与林长民 / 103

初识林长民 / 104

党派合作 / 105

宦海政潮 / 108

五四运动 / 114

曹锟贿选与善后会议 / 118

社会活动 / 121

林长民之死 / 124

后人的交往 / 129



第五章 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 / 133

仰慕至极 / 134

初次见面 / 138

“新文化运动”与白话诗 / 142

学术交流 / 145

《努力周报》与“胡适派学人群” /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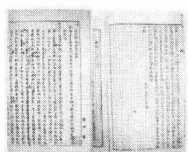
梁启超北大演讲 / 152

关于一套书目的争论 / 157

整理国故 / 159

科学与玄学之争 / 161

一副挽联话衷肠 /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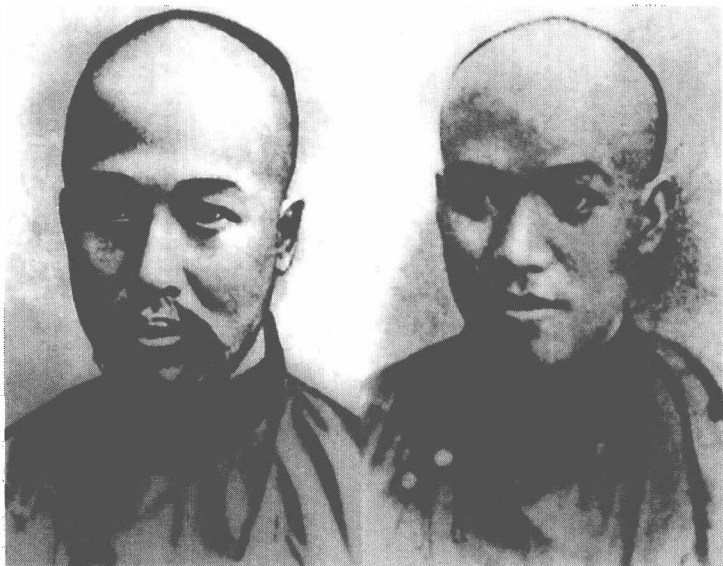
主要参考书目 / 168

第一章 梁启超与康有为

绕不开而不得不绕开的康、梁

提起康、梁，大约现今略有历史常识者都能明了这是晚清民国史上重要角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并称。而除了单单指代这师徒二人之外，“康、梁”也背负着诸如维新、变革等等意义。这当然与戊戌年两人作为主要谋划者参与的变法运动有关，当年的梁启超自然还是对身为老师的康有为唯命是从，但流亡海外之后，康、梁渐渐分道扬镳，到了民国初年梁启超组党、入阁，风头盖过了乃师，康有为也有尊孔、复辟等等举动，一直活跃到 19 世纪 20 年代。故即便仅从戊戌年算起，康、梁师徒无论分合，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等等方面弄潮也有二十余年。可谓是谈论晚清民国史所绕不开的人物，康、梁尚并肩一心一意之时，在国内策动的一系列风潮影响尤为巨大，戊戌年的事态实在可以说是晚清最后十余年过程的主要总因。然而正是如此，康、梁又恰恰是晚清民国史上所必须要绕开的人物。原因在于，师徒二人在戊戌年的作用甚为关键且政治斗争中隐秘不可告人者多，故而其记忆和书写显得颇为谲诡。况且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以宣传煽动见长，甚至可以说是吃饭的本领，又由于是亲历者，关于这段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手中，一传十，十传百，即使以讹传讹，大家也已经尽信以为真矣。流传至今，在近代宏大历史的谱写方面，借用《李尔王》中的台词，就是改革和维新已经镀了金，高高地坐在历史进步的宝座上，事实的利剑或许也会迎





康、梁总是被并称。

之而断。梁启超以多变闻名，不讳言所谓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曾经亲口承认并不能保证哪怕是自己在戊戌年事变之后不久写就的《戊戌政变记》为信史。舞台上的重要演员，又正是放出环绕舞台迷雾者，亲历、亲为却出于宣传及其他目的，对真相有所掩盖，书写有所去取，即因如此，故称康、梁师徒为历史上所不能绕开而又不得不绕开之人物。

康、梁早期生活与会面

康、梁二人相见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秋天，当时的梁启超18岁。梁出生在广东新会县能子乡的茶坑村，其幼时的成长经历与一般孩童无异，在家里由长辈教授功课，唯根据众人回忆，小时候的梁启超就才思敏捷，主要是为文的速度和思路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神童。10岁，梁启超就到广州去应童子试，据说梁启超彼时喜啖咸鱼，赴广州途中有同舟之人戏出题，命以咸鱼为题作诗，梁启超张口就是“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一下子把咸鱼的两大主要元素鱼和盐的意境推远到三代的故事，不论用典和工巧都恰到好处，实在是超出一一般十龄儿童许多。

11岁时，见到《辘轩语》以及《书目答问》，这是张之洞所作入学门径之书，故而梁启超自陈开始知道天地间有所谓学问。初识学问的少年梁启超，即可见其日新和善变，本在功名科第的家族期望中，于八股帖括之外不知别有所学的他，12岁喜词章，13岁知有段、王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居然渐渐有了“弃帖括之志”（不过此根据梁启超的《三十自述》，当日的童子是否如20年后的变法宣传家一般要弃绝八股等一切旧框架还有可议之处）。16岁时梁启超正式进入广东乃至全国而言赫赫有名的学海堂，这是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专门设立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是学问殿堂的最高学府之一。据说在精英辈出的学海堂里，梁启超的神童本色又一次显现，四季的大考都获第一，获此殊荣者除晚清另一闻人文廷式之外，只有梁启超了。

光绪十五年（1889），对于刚刚17岁的梁启超来说绝对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由于光绪皇帝大婚，举行恩科，广东的乡试中，梁氏高中举人，榜列八名。当日的乡试主考为贵州人李端棻，这个广东第八可以说与李主考大有关系，见识了梁启超一泻千里般文采的李端棻并不以梁文的肤浅而小看之，相反，将之置于前列，并且因为梁启超的才气，要把自己的妹妹，由副考官作媒，嫁给梁启超。虽然并未达到金榜题名，但终究榜上有名收获举人头衔，而17岁的年龄也让梁启超可谓占尽先机，相比二三十岁乃至于不感知天命的老举人来说，中进士的几率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同样，虽然要到两年后的京城中才完成洞房花烛夜，但毕竟终身大事有所着落，谓之双喜临门毫不为过。青春大好岁月自然会让人感觉未来不可限量，这一点李端棻毫不讳言，他常对人说，梁家的后生，尽管尚稚嫩，就家境来说也只能是寒士，但是金鳞不是池中物，终有一天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而且预测梁启超来日的名声地位在他之上。年轻的梁启超在光绪大婚的同一年，功名和家庭双丰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知梁氏在彼时自己有没有意识到，尽管中举和订婚实际上是接踵而来、互相关联的，但是如果打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学而优则仕的话，或许和李大人的联姻相比而言更加关键，甚至可以说这一场赏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康、梁的相遇。如果偏要做历史的假设，即便日后的梁启超没有认识或跟随康有为，也很可能闯出一份事业和声誉，就像其大舅子所预料的那样，“它日名位出吾上”。何以如此？自然要考量晚清





年轻时候的梁启超。

的政治运作以及科举仕途的风气，这在下一小节自有介绍。

光绪十六年（1890）相较于关键的上一年来说对青年梁启超的影响更为巨大，这一年，他出省北上，去参加全国性的会试，也许是去年境遇过于顺利，被认为还太年幼而由父亲陪伴入京会试的梁启超这一次名落孙山。从以后的回忆来看，梁启超的这次落第，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在从北京回家乡的途中，经过上海，梁启超自称直到那个时候，购买并阅读了《瀛环志略》之后，他

才了解到之前闻所未闻的五大洲各个国家。顺带说一句，这种经历在中国近代并不少见，相形之下，陈独秀认识到世界局势可谓更晚，根据他的回忆，恰恰是在庚子年间，因为八国联军的出现方才明白原来这世界上是分成一国一国的。据梁氏《三十自述》，当时在上海还见到了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其他西书，但是因为囊中羞涩而未能买下。

不过，回到家乡的梁启超认识了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也在学海堂学习过的陈千秋（通甫），当日并以才高闻名，从陈千秋那里听说有南海康有为这么一号人物。根据梁启超的自述，听陈千秋说康有为之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也说是陈千秋先来拜师，而当日之梁启超还颇自负于少年科名，直到见面之后，醍醐灌顶，犹如被当头棒喝，一夜不眠，第二天再去请教为学方针，于是拜在康南海的门下。次年，师徒三人开办了万木草堂。梁启超当年虽说已经有举人的名分，但是毕竟未冠，年资经历和知识面皆不足道，而康有为尽管功名还低梁一级，不过到底是老江湖，收服梁启超并不太费工夫。长兴里自己的草堂已经建立，来的学生大多数20岁上下，尤其以十来岁者居多，大家和梁启超一样都没有什么阅历，草堂里的功课无

非也就是《宋元学案》、《资治通鉴》以及《文献通考》等。当然还少不了康有为正在琢磨的“人类公理”、孔子改制和新学伪经之说，大抵定价在一个大洋一种的西书译本梁启超买不起，康有为倒似乎表现出财力丰厚的样子，号称大购西书以归讲求，并且还要看看《万国公报》等传教士的期刊杂志。于是能够将其所理解的“梗概”拿出来传授，门下一帮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自然已经非常满足，大叹服于他们的先生了。

自附为康叔刘康公后代的康有为出生于咸丰八年（1858），当日之中国，正处于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死战中。而实际上围剿“发匪”的主力无非是曾、左、李手下的湘、淮、楚三军，康有为祖父的从兄弟康国器在左宗棠军中渐渐以悍勇而受赏识，成为可以独统一军的人物。由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初期所暴露出的兵将互不相知的问题，曾国藩草创湘军时就定下规矩，实行一级级的招募体制，一营的营官战死，此营即行解散，即便打算保留之，也要先解散，再由继任的营官重新招募，目的类似于一朝天子一朝臣之

义，就是为了士卒用命。这种体制及其衍形基本上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成为军阀的根源，直到国、共两党苏维埃式的军队模式的出现，方才走下历史舞台。军务繁忙，没有现代军队组织中参谋部之类的机构以及后勤部门，但是也有营务处、粮台和幕府来承担这些事务，参谋和后勤对于战争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自然要任用靠得住的人，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就是缘此被康国器看中，



意气风发的康有为。





在幕中掌管书记。待到保举军功，成为候补知县，虽然保举泛滥，但好歹等到实缺，不料未及上任就病逝了。

失去父亲的康有为就在身为学官的祖父的教育下成长，有人认为康有为的这段日子对他以后的道路非常关键。首先是在祖父身边的督促学习，使他对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同样文史的启蒙也不会太晚。更为重要的是其祖父掌管州学，带康有为在身边耳濡目染，对于权力、仪式和学问的结合一定看得很透，少时天资不差的他也必定会受到地方诸生的关照和讨好，狂妄自大的脾性很可能成于此时。其实，每一时代都会有这样那样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乃至于非圣欺师的狂生，按照孔夫子的说法，不能中庸者，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实际上都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在平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井然，虽然有狂妄至于思出其位者，但大体还能将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若要破坏安定和影响他人，则毫不客气严加管束，否则，依其兴趣加以安置，或能做出异于常人的贡献。晚清恰恰不是这样一种能合理“利用”狂生的社会，众人都处在方向的迷茫和行为准则的困惑之中，自命不凡而不安分者此时往往纷纷出笼，鼓售其术，妄图一步登天，站上风口浪尖，康有为可以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一旦闯下巨祸，则南海圣人是要救天下的，自然没有必要如匹夫匹妇一般自经于沟渎，于是一走了之。

同时，日渐兴盛的康家，也开始附庸风雅，举办族学，康有为在其中制艺没有提高，说部诗画倒长进不少，于是本来狂放的心胸更加野开去，不复收拾。尽管光学八股文，或许不免迂腐，识见肯定也不够，但是若从四书经义先认真真入手，起码做人的架子是不坏的，此后可以再游于艺，饱览群书，则可谓入门正，而以科举为无用之学，埋身于旁门左道，玩物丧志，也不过只是放纵而已。任何一时代的基本选拔考试根本不可能包揽这一时代的所有知识，哪怕是所有“有用”的知识，于是考试的标准则自然应该表明，这一时代学问的门径以及参与考试者被认为必须具备的素质。社会分工不同，各有技艺，孟子早已明言其理，科举这样的社会基本选拔考试，往往在功利和实际使用的角度上被认为是无用，但如果此类考选真的要详细到稼圃的程度，则肯定成为一大笑话，培养出来的人多半也定是小人。近代以来的紧迫环境逼使人们总要求科举制度对危局做出回应，然而往往忘却了科举内容“无用”的本义

所在，直到人云亦云痛打落水狗，只要是安心学习制艺必是陈腐老朽，而各以早不屑于科举为标榜，却不问不学八股到底是去干什么勾当了。

心野而已经无所羁绊的康有为在朱一新门下待了一阵，终于还是云游去了，当日看来光怪陆离的西学又把他吸引住了，此外康有为还结识了一批文人学者，光绪十五年的上皇帝书让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声名。33岁那年，收了陈千秋和梁启超为徒，如果以康有为也十分尊崇的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要务，当然替手首先要从做徒弟开始培养起。梁启超不论文采和办事，足以成为左膀右臂，以早期的表现来看，梁也是一心一意跟着老师，捧着老师的。第二年，万木草堂开张，康、梁师徒大展拳脚的日子终于来了。

科场寻卷与康、梁的科举之路

以清代，尤其是康、梁所处的时代来看，如果要学而优则仕，首要的条件理所当然的可能还是要一个功名，尽管晚清士人的出路已经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向，有些人已经不再将全部的热情和注意力都放在科考上，但是一个社会毕竟有一个社会的普遍之处，虽然已经有变化的迹象，金榜题名还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共同理想，同样这也是一个读书人是否可能进入官场乃至实现治国平天下抱负，抑或能否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衣锦世间的重要门槛。然而考上之后，并不是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就摆在眼前，此后官场的升迁和累进的过程甚至被形容为九转丹成，这一步也仅仅是少数人所能够走到的。不过希望进入仕途，改造朝廷的局面，说一千道一万，一切的一切，还是跨过科举这道门槛。

当时的科举考试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情况，就是找卷子。现在的高考，若要是听说了找卷子这样的事件发生，是一定要指为高考舞弊的，于是乎高考的反舞弊手段也是道高一丈，绝对不允许考生有关信息出现在卷面上，乃至利用电脑阅卷，最大可能排除人的因素。当时科考也有许多措施，阻止考生和考官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比如誊抄考卷，让考官无法通过字迹辨认，但大抵并不如现在的许多反舞弊手段，于是存在各种通气之举，夹带抄袭和请人捉刀就不去说它了，光是巴结了考官，





以前的人生棋，要从白丁一圈圈转到当中的三公真不容易。

让其寻检试卷的手法就种类繁多。举一有名的例子，某次科考，有人为陷害考官，暗地里和考生通气，结果考生的八股，每段最后一字连读为“一朝平步上青云”等等。不过一定要注意到一点，科举考试和今日高考一个绝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当今的高考考场当中，不出意外，大多是适龄的莘莘学子，或许有复读重考的，但大都年纪尚轻，没有人会复读一辈子，因为高考说到底本就是争取一个入学资格，与科举考试成功之后的益处相差太远，更何况高考一年一次，周期也比一般来说三年一次的科考要短。但是科举考试则不尽然，鹤发童颜者比比皆是，这一点不同，不可小看，因为应考的考生并不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所以，社会关系、社会经验和声望都不似高考考生那样简单。很可能考官手中的卷子作者就是比考官年纪还大者，比考官学问还好者，或者在士林之中比考官名声更大，乃至于更加出言有力者。本来，科考就被视为国家的抡才大典，的确需要肃清暗通款节的舞弊行为，以保持其神圣庄严，但是为国家找到有用之才也是命题之一。所以在当时而言，找卷子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不光彩的一件事情。

结合之前所论，在同光之际文臣起势，士气汹涌，各方面都希望将确有才华、在民间士林真正有影响力者收入囊中。基于此，考官寻某考生卷子的事情往往成为一段佳话，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翁同龢和张謇之间的故事。张謇，江苏海门人，出生于咸丰初年，到中状元时，已经年过四十，幼时即被人看好为读书种子，早年因为冒用如皋张氏之籍，遭索

酬无已，于是“冒籍案”发，幸得爱才之人保护，方才过关，但是也算走了一段弯路。于是他投入吴长庆幕府，和袁世凯成为同僚，并列为庆军中的文武两大幕僚，曾经随吴带军赴朝鲜平“壬午兵变”（说是朝鲜兵变，其实出动清军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打掉日本人征韩的非分之想。所以在甲午当中，张謇极为翁同龢所倚重，自然除了翁身边的文廷式、志锐等当时已经遭到罢黜，张所拥有的在朝鲜对付日本的经验也是为人看重的重要原因）。在周转了多年之后，张氏终于在顺天乡试中考上举人，此时他已经三十多岁，由于帮吴长庆草拟奏疏以及之后的救灾和主持书院而声名远播，也为翁所瞩目，所以曾经多次在会试阅卷当中找寻张的卷子，于公可为国储才，于私也是为了让自已成为张的座师，既收得力弟子，又可得识人的美名。不过终究造化弄人，数次误将他人考卷错作张謇而取中。（想来翁并非无眼力之人，也并非一次寻卷，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之交臂，大概只能说是天意，做一假设，如果张謇在最初的1885年就为翁揽得，成为左右手，而不是恰值父丧的甲午，那么甲午、戊戌前后的翁是否还会逼促若此，那段历史是否也会改写呢？）其中张謇中状元之前的一次，最为诡异：光绪十八年（1892）的会试，主考官正是翁同龢，而经历了数次命运作弄之后的张謇已开始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了。翁同龢害怕张的卷子再如以前一样被遗漏，所以关照考官们一定要仔细寻检。某考官得到一卷上有“历乎箕子之封”等语，翁以为由此语可知，卷主必有游历朝鲜的经历（传说中箕子赴朝鲜，开创朝鲜国），非张謇莫属，大家也都对此卷的作者为张謇深信不疑。然而等到拆开封处一看，此卷并非张氏之卷，而属常州刘可毅。但此时，由于名次已经斟酌议定，科场大事严肃，不可随意更改，翁同龢只能仰天叹息，而无可如何，只能接受再一次阴差阳错的结果。（也有一种讲法是说张謇与刘可毅一起去拜访翁同龢，翁大谈：“今日时势，宜统筹全局。”正可谓有心栽花，无意插柳，第一场考试，刘可毅就将“统筹全局”四字嵌入八股文稿的破题之中，翁就以为必是张謇的，没有细阅全卷，即定为这场的第一名。第二场又因为“策马三韩，雪花如掌”一句，以为必是去过朝鲜的张謇的，取为第一。结果两卷都是刘可毅。）此处多说一句，那位所谓的幸运儿刘可毅之后却并不幸运，此人之名乃会试前所改，及发榜，报子急于领赏匆匆一看，误报刘可杀（“杀”繁





状元宰相翁同龢。

体作“殺”与“毅”相似，这也有另一说，称乃印刷红榜时候印错，想来虽然报子眼力不济，大概总有脑子，不会傻到真的以为有人起这样的名字，所以还是印错可信），故为会馆中同乡戏呼，刘旨精于谶术，以为乃大恶兆，后小心翼翼，以求避祸，庚子乱起，即避出京，然而终究不免，传于通州遇害。

由此观之，当时的寻检试卷，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而且不

少士大夫还因错过名士扼腕，张謇甲午恩科终于取中状元，据说翁还帮忙在该卷子上挖去忘补的地方填上一字（考卷不得涂改，但是本身有多层，纸张较厚，可以挖去重写）。尚算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时局已坏，不过此段峰回路转的故事至今仍被大家当做伯乐佳话流传。

相比张謇，康有为自述其所听闻的闱中内幕，更显曲折，关于其试卷在考官手中的沉浮，康有为的自述性文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当年的主考官在确认康卷之后却是故意让其名落孙山。根据《我史》，时在光绪十四年，也就是1888年，康有为进京参加顺天乡试，去博取举人的功名，此时康、梁还没有相遇，而他们在科举道路上也基本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相反到了第二年，后来的康老师还是无所斩获，而梁已经有了举人的头衔，可以参加京城的会试了，不然的话，后来的师生很可能在会试的考场提早相遇。而康有为以为，那次考试之所以失败，全因为倒霉倒在了老顽固徐桐手中，他在自述中自我感觉良好地说：当年他康某人的名气已经相当不小，并在那场考试之中本来就

将以第三名高中了，只是由于知名度太大，而且经论的气势宏大，考官们不仅听说过他的名声，甚至可以认得出他的卷子。于是当时的考官之一，孙诒经随口说了一句，这应该是康有为的卷子。主考官徐桐素来讨厌康有为，以理学正宗自命的他当然不喜欢康狂妄的言论著述，所以将康的名次拉下。当时还有不知好歹的考官为之争辩了几句，结果徐桐更加恼羞成怒，于是这次乡试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当然以上都是康有为自己的讲法，结合徐桐在变法中的立场和庚子事变的惨淡下场，大家似乎都愿意相信康有为的这次科举征途就葬送在一个泥古不化、讨厌变法维新的老官僚手中了。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与落榜相伴的，并不是康有为回到家中苦读，以期待下次考试的高中，在乡试落榜之后，康并没有离开北京，而是向清廷进行了第一次上书，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上清帝第一书》，这其中的关系和背景，在之后将有所提及。

不过后来，大家略略翻检当日的档案材料就发现，《我史》上记载的这段《世说新语》般的小故事尽管短小简洁，写得读者身临其境，又符合之后的历史逻辑，但关键问题是光绪十四年的顺天乡试考官当中既没有徐桐也没有孙诒经。当今的研究者认为，康有为的《我史》当中不乏自我辩解和美化，甚至为了宣传等目的，不惜经常篡改事实。其实康在北京参加了十四年常规的顺天乡试和十五年为了庆祝光绪皇帝大婚的恩科，结果两次都名落孙山，而且前一次十四年的主考官和事实上有最终决定权者就是翁同龢，这与康有为宣称的当时他已经名声大噪以及翁也非常看重他实在是相当矛盾的，于是移花接木的功夫就值得一用，十四年、十五年的两次考试，到了康的笔下就成为了一次，翁在此也不见了踪影，罪魁祸首便完全归咎于十五年的考官徐桐一人了。当然这还是在基本相信康有为所述基础上的辨析，否则至于考闱中的秘闻是怎么传到康的耳中，乃至于是否真有这段秘闻就很叫人怀疑了。

之后，康有为虽然自我表示称当时已经没有科举考试的动力和念头了，但在诸父和母亲的强迫之下，终于前往考场，这次时来运转的他考取了举人。到了光绪二十一年，正值中日战火纷飞，号称无意于科场功名的康有为带领弟子们冒着大沽口海域已经被日舰队控制的危险，依然坐船上京赶考，并一举成为进士。当然，最终二甲四十八名的等第还是让心气颇高的康南海感到不满意，这次的账又算到了徐桐的头上。在





《我史》当中，康称根据内部消息，本来会试当中，他的卷子排在第一，可能被选为会元，但是徐桐又出来横插一杠，将此卷贬在第五，这次他倒没有认出这是康卷，否则必定不是这般结果，等到发榜后，徐看到康竟然在自己手中高中贡士第五名，气得叹息道：“康祖诒由我自中，始知科名前定。”不过还是关照门子一定要拒绝康有为作为门生例行的上门拜访，但是似乎徐桐忘记了康有为原本是怎么一号人物。本来有所谓“清代主考皆欲罗致知名之士为荣，盖喜其易于腾达也。中试者必谒座主，呼为受知师，终其身弗改”的惯例，似乎这也是很能让人接受的一种礼貌表达，但是康有为偏不如此，尽管房师在家中等候多时，并派人前来问询何以还不行拜师之礼，结果得到的是康有为开出的条件，一不下拜，二不以师生向称，方能上门。对于这样的人物，徐桐还需要特别关照门子吗？到了殿试的时候，康有为自称在卷子上直言时局，本来翁同龢准备把他的卷子提为状元的，但是问题又出现在了阅卷大臣李文田身上，康觉得李和他的“先中丞公”有矛盾，所以也故意将他的卷子拣出几个错误，扔到二甲里面去了。其实李本就是这年会试的副总裁，如果有心泄愤，早可以在会试中将康卷剔除。

接下来可以看看和乃师大不相同的梁启超这边的观感，在自己以及身边人的回忆当中也提到了乙未恩科的遭遇。这些回忆基本上都认为在会试的时候，梁启超作了康有为的替死鬼，或谓李在阅卷时候拣出梁的考卷，误以为是康有为之卷，将之贬抑。但似乎更有说服力的还是徐桐将梁卷混为康卷丢出，而李文田实际上并不认同，还在他以为才气颇佳的卷子上题了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搞得梁启超也异常感动，在李文田去世之时，还痛挽之。

此后，李文田与康有为结下梁子。在第二天进行的事关分配的朝考当中，李继续压制康有为，本来二甲的进士要在朝考中获得好名次，才能进入翰林院，成为国家储备的人才中的一员，当然在翰林院可以在比较宽松的情况下和各士子交往，广阔人脉，而且本来翰林院的出身在清代政治当中就占有不小的优势。康有为朝考不成功使得其翰林之路堵死，只得被发往工部做一名六品的主事。尽管也有经济困难的进士故意考不好，希望拿到俸禄略高的六部职位，但是对康有为来说过早走上小官吏的道路的确对其宏图有损无益。也有人假设，如果康有为能够进入